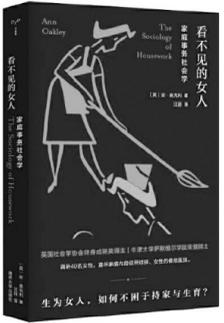


# 被逐出社会学视野的家庭事务

庄加逊

**提示** 近日,“全职太太”一词引爆舆论场。而《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这本由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发表于1974年的论著让我们意识到,46年来物质文明发展如此飞速,女性与家庭事务的相关研究议题在社会学领域的发展竟如此迟缓。在《看不见的女人》一书中,作者安将社会学中对家务劳动的忽视这一议题与其中对女性存在的偏见这一更广泛的主题联系起来,但她从未试图为女性的困境树立“假想敌”,她在意的是,如何将问题真实地展现在公众视野面前。因为,唯有了解真实本身,才有资格去思考或争辩何谓出路。



在一个领域“极度被看见”与“不被看见”常常是一回事。这当中的说法有太多细节值得探讨,我们单说一点:“全职太太”等同于依靠男人。当“全职太太”就意味着是依附于丈夫的寄生虫吗?日本女性主义者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女权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是发现了“家务劳动”,而资本主义下的市场并没有包括人类全部的劳动,于是,非“商品化”的家务劳动就成了一种“无收入的工作”,这意味着它是不被正当剥削的“无偿

劳动”。上野千鹤子进一步提出,女性在家庭中抚育子女、承担家务若按市场价值折算,整个社会都欠这些女性一份不菲的工资。

## 被歧视的家庭事务

探讨性别话题时,人们受制于社会学现有发展理论以及周围环境潜移默化的教化影响,这一点常被略去不谈。女性的现实处境其实是每天从社会态度与社会概念中建构出来的,比如,当我们说“女性意识觉醒”时,事实上,更多的是女性意识方面研究的觉醒在发挥作用;如果一个群体在社会议题中被扭曲或隐去,那么社会学理论研究也难辞其咎。

这本脱胎自安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论著缘起于她本人的切身体验。1967年至1969年,安从事着全世界大多数女性惯常从事的职业——照顾小孩和家庭。这个角色所带来的社交孤立与不被重视感让她感到莫名恼火。对于从20世纪6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普及中受益的女性而言,更是沉重一击。在大学学习过哲学、逻辑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安,曾以为这些习得的理解框架应用于家务劳动研究也会很有价值。事实证明,安根本找不到持同样观点的学术大家或导师为自己的想法背书。甚至很多前辈,同行困惑于安的选择,认为这是一个“自降身价”的研究方向。家庭从来不属于社会学领域范畴,它被归于私领域与非理性的情感空间,而躲在人妻、人母性别设定面纱背后的女性便成了彻底的隐形人,她们在家庭中的实际工作一并被抹去,继而引发了“职业母亲”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这个术语的外延是指那些在家庭劳动以外工作而获得报酬的母亲,就仿佛女性在家庭中的无薪劳动根本不算工作一样。

是的,它们的不被视为工作。这不仅体现在人们的意识偏见中,甚至是法律与税收制度中默认的认知,它被视为无偿劳动排除在国民账户体系之外。家务劳动地位之低与女性的低社会地位相结合,使得无薪或低薪的家

庭工人成为世界上最受剥削和压迫的工人。最低工资立法仍未覆盖数以百万计的女性家务工作者,而且她们中许多人仍遭受着被困在家和遭受家暴的危险。由此,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人权问题亟待解决,而这与家庭事务的社会定位紧密相关——家务不被视为“真正”的工作,因而是一项政府可以忽略的活动。“家庭事务”被驱逐出“社会学”研究的领地,成为一个在实质上被视为理所当然不予理会的黑洞空间。而在这个空间里操持的女人,便成了“看不见的”、不受社会照看的、也毫无社会价值的人。

安开始反思,是社会学理论建构本身出了问题,并在书中开门见山地对社会学中对女性的固有偏见和社会学创立者的性别盲视进行炮轰,称家庭事务中女性的不被看见以及分工不平等现象乃是“社会学中的性别歧视”。唯有看到这一点,从社会学研究中开始改变,女性话题才有真正被严肃探讨的可能。安将社会学中对家务劳动的忽视这一议题与其中对女性存在的偏见这一更广泛的主题联系起来,《看不见的女人》也因此成为严肃对待家务劳动的研究文本,它所带来的长远影响远超安的预期。

## 40个女性困境样本

《看不见的女人》从未试图为女性的困境树立一系列“假想敌”并一一加以抨击,作者在意的是如何将问题真实地展现在公众视野面前。唯有了解真实本身,才有资格去思考或争辩何谓出路。至少,在安的眼中,“全职太太”的真实依然混沌,家庭事务里内部的不公允未被正视。于是有了这40个伦敦家庭主妇的调研样本。为了获得相对均衡的样本,接受采访的女性年龄均在20岁至30岁,已婚,并且都为母,至少有一个5岁以下的孩子。其中有6名女性在家庭外受雇工作。40名女性中有一半是“工人阶级”,另一半是“中产阶级”。所涉问题包括背景资料调查、家庭工作条件、家庭例行常规工作、对工作任务的态度、家庭工

作的标准与规范、家庭主妇身份认同,是否从事过带薪工作以及对职业角色的态度、女性角色认同、婚姻关系、对家庭工作条件的掌控、总体满意度等。显然,这并非一份有广泛代表意义的大规模数据集,基于采访形式的调查也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毕竟,人们有时会因为面子或社会、传统偏见而隐瞒自己真实的想法与感受。但安认为,这40个样本对于揭示女性在家庭事务中的真实情况已然足够说明问题,对于家庭主妇形象的描绘不仅能加深人们对当今社会女性状况的了解,而且它也有助于人们了解都市家庭生活的某个面相。

调查结论显示:家庭主妇每周工作时间很长,平均时间为77小时;主妇对家务的不满普遍存在,受访女性中有70%的人对家务的感受总体评价为“不满意”;单调、碎片化是一种共同的家务体验。这里若干数据以及结论因为年代久远而出现偏差,但最值得注意是所有女性都不满家庭主妇地位的低下——“家庭主妇”一词暗示了社会声望之低与家务事之琐碎。它让人离群索居,感觉无聊,要求苛刻又没完没了,令人精疲力竭。它会侵蚀你的自尊,将你同世界割裂开来。但当这些受访的家庭主妇被要求就女性解放运动发表意见时,她们所表达的态度大多是消极的:40名女性中有8名根本没有听说过女性解放运动,其余大多数人则认为大众媒体上所描绘的激进形象十分搞笑。有人偏向选择保持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以及强调要保留女性气质的传统特权等。对于男性在婚姻中享有更多自由的抱怨变成了一种主张,以至于人们认为女人更多地被家庭限制和束缚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丈夫在家务劳动和育儿上缺乏参与的反对意见被转化为女性更擅长照顾孩子和家务的观点。我们在此发现了某种矛盾,女权主义运动在公共视野蓬勃发时,并未触及真正理应承担解放的女性场域,她们在家庭领域的“不可见”或“无效能”导致了女权运动成为有限的女权,或者被男性社会主

导所裹挟的另一套男权。显然,维持婚姻现状的愿望与对性别差异的普遍保守态度相吻合,没有人认为女性应该抛弃对家庭和家人的传统责任,或者是在夫妻之间分担责任。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开篇。如果家庭场域里的不公没有得到改善,女性依然需要从繁重的家庭事务,那么倡导女性独立将导致一个更沉重的后果,她们既需要与男性同在职场上工作,为同工同酬而争斗,又要承担家里的辛劳,却只配一份远低于男性的收入,这便是现代女性所面临的双重压力。

## 身为女人

读过《看不见的女人》一书的人一定会发现,作者并没有把女性身体层面的特殊性——即承担孕育的特殊职能单独拿出来讨论。我可以理解这种做法,作者不希望这种与生俱来的物种天职破坏数据样本的社会性。那样一来,男性主导的社会便有机可乘,将女性的现状归因于生理与性别特质。但我始终认为,生育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件很拒绝的使命与牺牲。正如上野千鹤子所说,并非所有女性都是自愿成为“全职太太”的,很多是囿于家庭生活的实际需要或被迫接受了所谓“母性”“母职”的意识形态。当年那个勇敢出走的娜娜或许今天能够在外过得不错,但终究她将再次选择回到家庭,面临她的困境依然没有解决。谁该为“出走”的娜娜负责,谁又该为“回来”的娜娜负责?安的女性社会学样本留下了更多的开放性空间,沿着她的思路我们或许对女性的生存真实有更多的反思。

让人灰心的是,一本讨论家庭场域内女性的书只能吸引其他差不多同等境遇的女性乃至母亲。她们大多经历了母亲的角色,并阅读相关读物来获取某些心理上的安慰。这些女性放弃了自己的公众价值,以换取一系列私人意义。然而,别人很难识别这种私人意义。写下这些文字,是为了哪怕有一丝希望,叫应该看到的人看见,应该思考的人思考,首先是女性自己。

## 书局

# 进进出出中 不都是各自悲喜着?

丁春凌

读再多的书,也无法摆脱生活中的烦恼。说得对。只不过,读书那一小会儿,等于你自己和困扰树起了一道屏障,暂时隔开尘嚣。这样,难熬的日子就过去了个把钟头。时间虽说不是药,但是,药全在时间里。

## 《时间里的中国人》

因为书名,找了这本关于时间的书来看。书的作者佳琪(Christine Cayol)是个法国人,从2003年起一直待在北京。但是,这本书是用法文写的,没用中文写,我想她应该是用法文写起来更顺畅,尽管她已经在华住了17年。中文,毕竟太难了。更困难的是,在佳琪眼里,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和他们法国人,太不一样了。偏爱高铁模式的中国人说:慢用,慢走,慢点开;在北京,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却总能挤出时间和你聚餐,哪怕你最后一分钟才约他。法国人的口头禅就是时间不够,时间是他们的枷锁……对待时间的这种差异,佳琪最开始感到陌生、抗拒,住久了,她反倒慢慢琢磨出了中国人和时间交朋友智慧。为什么中国人和西方人不一样呢?时间是什么呢?到底该怎么对待时间呢?找不到答案。佳琪写了两本书——《为什么中国人有时间》《十句中国格言的智慧》,用法文介绍中国人的生活与智慧,引起了不少好奇,其中,《为什么中国人有时间》还被翻译成西班牙语、荷兰文。看看吧,一个闯入者的视角,写咱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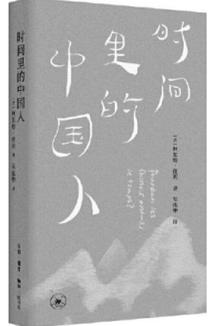
## 《伦敦人》

去年10月份买的这本书,一直没读完。放到枕边,每天翻上十几页,总算是看完了。克萊格·泰勒是个有意思的作家。他在加拿大西部海边的一个小村子里长大,童年的多数夏天,他都要穿过整个加拿大,到安大略省南部的锡姆科湖畔,和奶奶度夏。她奶奶的厨房里,有一张伦敦的俯视图。估计是湖边玩腻了,泰勒花了不少时间盯着那张图。2000年的秋天,泰勒从多伦多搬到了伦敦。书里没交代他为啥去伦敦,从序言里,我感觉泰勒是因为那张俯视图。你看着,童年记忆对人影响深远吧。在伦敦南部的布里克萨特租好房子后,泰勒开始背着帆布包,拿着一本发黄的《伦敦大全》,四处走动。晃晃荡荡观察每天见过的伦敦人时,泰勒一不留神就盯得有点儿久。5年里,他在伦敦街头采访了大约200个人,对有些采访,泰勒会花上几个月安排会面,可是,访谈全程不过10分钟。有的采访却能一遍遍地回访。最后,泰勒从200个人里选出了85个普通人,将他们的口述集结成了这本浮世绘——《伦敦人》。对了,伦敦人的职业——悲伤辅导员、家庭安全专家、专业施虐者……真多啊,没听过吧?看着这些充满街角气息的讲述,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大同小异。进进出出的人,哪一个不是有着各自的悲喜呢?问题是泰勒采访这200个人时,都是咋搭讪成功的呢?书里没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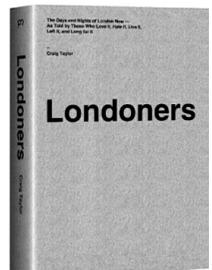
## 《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

托尔斯泰写日记的时间起点没查明白,我看到最早的是他19岁写的,而且他几乎一生都在写日记。这本日记写于1910年,是托尔斯泰在世的最后一年写下的。从1910年新年第二天写起,到11月3日结束,304天共写了266篇,只有38天没记。要知道,那一年,托尔斯泰已经82岁了。咱们看看他都记了些啥。1月2日:在好天气里散步;1月6日:什么也没有写。夜里,看无聊的电影,玩牌;3月10日:照例很早起床,吃饭、象棋、闲话、纸牌、留声机。我觉得非常可耻,而且讨厌……真的是很普通的日记。每天起床后,接待来串门的,看信、回信,骑马、散步,修改稿子。更多的日子,托尔斯泰都是,啥也没干。就是这么回事,你的痛苦、无奈、孤独,全有回响,没啥特殊——哪怕是说出“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托尔斯泰。如果还是觉得你的悲伤独一无二,也行吧。

## 《时间里的中国人》



## 《伦敦人》



## 《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



# 机智穿越千年

王海宁

2020年快过去了,如果年初老板拍胸脯答应你涨薪升职的事儿,到目前一样也没兑现,可是还要求你像驴一样干活,你打算怎么办?

单刀直入,逼急了,反目成仇;默默忍受,不甘心,无疾而终。两条路都不好。这样纠结的事儿,《舌华录》里的古人有个公案案例可以借鉴。

南齐太祖萧道成曾当面许诺让张融做司徒长史,但诏书一直没有发出。张融骑着一匹瘦得不能再瘦的马四处溜达。太祖见了就问:你的马怎么这么瘦,每天喂多少粮食?张融说:每天喂它一石。太祖困惑:那为什么还这么瘦?张融回答:因为我只口头答应,实际却不给——第二天任命书就下来了!

说个段子,立竿见影——秒杀今天的官样文章。看到这里即使你没这勇气跟老板旁敲侧击,但也会会心一笑,封官许愿自古就是上级挂在下级鼻子前的胡萝卜小游戏。知道自己的窘境不孤单,是不是立刻减少些许压力?

《舌华录》这样春秋笔法的古典段子,不胜枚举。但掩卷沉思——不仅我们的段子是古人玩剩下的,而且我们面临的尴尬困惑古人也早用谐谑化解;我们不屑地装腔作势,先贤早就冷语讥讽。职场官场情场百态,《舌华录》里的古人舌灿莲花,早有教科书般的神回复。

职场一言不合,如何吐槽对手?苏轼和司马光讨论时事意见不合。苏轼说:“你的这种说法是老鳖乱踢。”司马光不解地问:“老鳖怎么能乱踢?”苏轼说:“就是因为不能,所以才叫老鳖乱踢。”苏学士的毒舌是不是让你觉得大快人心?你是吃货还犯懒?老被家人唠叨批评?《舌华录》里有一劳永逸的法子让你为自己开脱。

杜郊公爱吃,而且吃饱了就睡,人们劝他这样不养生,他不听,还辩解:“没见过米袋盛米?放倒了就会漫出来。”——直接承认自己是饭桶,看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舌华录》作为一本收录奇人妙语的小说,并不只是浅薄的搞笑,它涵盖

的人间喜剧上自庙堂宗派斗争,下至市井饮食男女,全书18章里除了隽永的谐谑、幽默的调笑,还有让人叹息的破碎和深沉的悲情。

在17章浣语中有个故事,令人动容。晋代孙楚有才而狂妄,只佩服王济。王济去世时,吊唁的名士云集,孙楚对着故人的遗体痛哭,别人也都流泪。他大哭之后对灵床说:“你生前喜欢听我骂驴,现在我再给你学一次。”孙楚学得非常像,以至于宾客都被逗笑了。孙楚痛苦地问:“你们这些人都活着,为什么却让这个死了?”

悲情到滑稽,深沉到荒诞,寥寥数语里的戏剧张力穿越到今天,我们依旧感受着生者锥心的痛苦孤单与无处宣泄的愤怒。

《舌华录》中有的故事,几如谶语。苏轼和章惇年轻时是好友,两人一同出去玩,在一处绝壁,章惇推苏轼去题字。苏轼害怕,不敢去。章惇面不改色走过去,在石壁上题字“章惇苏轼来游”。事后,苏轼抱着章惇背说“你肯定能杀人”。

章惇不解,苏轼解释:“能豁出自己命的人也是能杀人的人。”后来,章惇拥护变法,而苏轼反对变法,二人交恶。章惇掌权之后,对老友苏轼也毫不手软,在苏轼60岁的时候,把苏轼贬到了偏远的惠州。昔日好友间玩笑成了照历史与前传的预言。

18章浣语中成汉皇帝妹妹的故事,如同一部长篇电视剧中的悲剧情高潮一幕。

东晋桓温灭了蜀地成汉,又娶了成汉皇帝李势的妹妹做了妾,很宠爱她。桓温的妻子是南康长公主,得知后,带着几十个奴婢要杀了李氏。一行人赶到,李氏正在梳头,书中描绘“发委籍地,肤色玉泽,不为动容。徐徐结发敛手向主,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见本怀”。

一个被历史洪流裹挟着的贵族女子身不由己做仇人的妾室,在大难临头时,宁可从容解脱,也不想屈辱苟活,意境远超今日宫斗剧。

《舌华录》如同无数历史盛宴中遗漏的亮晶晶的盐粒,看似微小,品之有味,它不是盛馐,却渗透其中,是不可缺少的味道。

# 艺术作品背后的文化更迭

曲宏

艺术史研究者张宇凌的《竹不如肉》一书,以故事为线索,串起了2000多年的艺术名作,将艺术史讲得趣味横生,正如该书在副题标示的那样,这本书讲的是“西方艺术史上的权力和身体”。围绕这一主题,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精彩剧目。

这部小书的结构很独特,从“雅典之爱”“弑僭主者”的雕像到“瞧,这个人”中的形象,从埃及纳芙蒂蒂王后与法老性别互换到赫耳马佛罗狄托斯的雌雄同体,从西斯廷壁画《最后的审判》的修改到《夫人与独角兽》中女主人公原型玛丽争取婚姻自主,绘制了艺术演进的故事长卷。从感官迷恋到归于精神性追求,从雅典英雄崇拜到“瞧,这个人”的自我主体的觉醒,让艺术作品具有了跨越东西方的永恒魅力。“与苏格拉底一起晨跑”

作为收官之作,似点睛之笔,让这些西方艺术作品与今天的我们有了千年不绝的联系。

身体和权力是相连的。在古希腊,身体强健与否是个政治议题,如果你身体不良,就意味着你是个不良公民。弑杀僭主的哈里斯托盖盖与哈尔摩迪厄斯两个爱人之间的力量足以抵抗强权,足以结束僭主统治,印证了身体的力量。这本书中从人的神化到神回归人的历程,体现了艺术家对人性的艺术探索。“瞧,这个人”这幅画的主体人物变化最为典型。本来,“瞧,这个人”题材来自宗教,但以画家丢勒为先锋的一批艺术家,在这个主题下开始大胆地探索自我,破天荒地,将这个“瞧,这个人”的自我主体,而且还对自己做了修饰,加深了自己须发的颜色,拉长了头发和面部,身披棕红色大

髦,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财主形象,尤其人物的眼睛直视观众。这种完全正面的形象过去是用来描绘神或圣人会使用的,但丢勒却把这种表现手法用在人的身上。丢勒究竟要表达什么?人正像他曾经写的那样:“要是你贫穷,你不可能通过这一技获得丰厚的财富。”他把苦难和忧患的一面掩藏起来,而财富、权力和荣光的一面却加以突出。这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人可以成为神之子,既神圣又富有。

沿着丢勒的道路,意大利艺术家卡拉瓦乔走得更远,他改写了每个人的神学性格。而把反面人物彼拉多作为画作中心,站在最前边,眼睛直视着我们。还有人更吃惊的地方,这个彼拉多竟然是卡拉瓦乔的化身,从物理外貌到苦闷的心情,都取自画家本人。画家把自己画成了“坏

人”,画成了一位受难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卡拉瓦乔比丢勒更能洞察人性。

与西方绘画放大人的形象不同,中国画源于“天人合一”的理念,把人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物在画中相对较小。而且,人物的情感不是通过人本身来表现,而是通过自然万物承载喜怒哀乐,像“八大山人”的《孤鸟图轴》画了枯枝、孤鸟、独目、独脚,可谓“孤而危”,这正是画家的心境。这比丢勒、卡拉瓦乔自身画面显得委婉许多。

身体作为传承文化的载体,从可见权力、欲望、情感等默默无声的变迁。古埃及阿玛纳时期法老阿肯那顿的王后纳芙蒂蒂,名字原意是“美人来了”。从视觉上看,阿肯那顿倾覆女性,纳芙蒂蒂偏男性,颧骨突出,眼线威严,唇线平直坚毅。有历史学家为此猜

测,纳芙蒂蒂是真正的统治者和改革者。《纳芙蒂蒂王后胸像》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她那独立女性的理性抉择、意志魅力和她那短暂而极端的乌托邦,一起融入她的形象中。与纳芙蒂蒂男性化不同,赫耳马佛罗狄托斯与萨尔玛客斯身体合二为一,成为雌雄同体,这代表着两种极端的融合,既是美的理想状态,又是艺术创造力达到巅峰的一种状态,更是心理多层维度、智力极度活跃的反应。

“竹不如肉”,竹木吹出的曲子比不上人的喉咙唱出的歌曲动听,因为“渐进自然”。正像建筑师和建筑史研究者唐克扬所说:“艺术史,是一曲权力和美、欲望和温情、身体和眼睛、荆棘和王冠……变奏的冰与火之歌。”身体,是艺术的一种宣示,彰显的是文化的变迁和永恒的人性。